

中日文化交流史 论文集



中日文化交流史 论文集

样初题 

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赵朴初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

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印张 347,000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1001·497 定价 1.60元

沁園春

祝中日恢復邦交

赤縣扶桑，一衣帶水，一棹可航。昔但真盲目，
浮槎東海，鼎鑊負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
同腎臟，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向千載友
誼，不尋尋常。豈容戰犯猖狂，八十載風
雷激大洋。喜雲霧霽，舟車渠成冰泮，秋
高氣爽，菊蕊花香。公報邦傳，邦交恢復，一
片歡聲起四方。以今後，望言行信果，和睦萬邦。

一九七二年秋作于北京

郭沫若

目 录

二千年来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邵循正 (1)

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常任侠 (7)

——译《日本绘画》序言

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裴文中 (20)

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王仲殊 (27)

鉴真在日本汪向荣 (54)

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梁思成 (81)

弘法大师与《文镜秘府论》王利器 (91)

古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胡锡年 (117)

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严绍璎 (142)

中国佛教净土宗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杨曾文 (166)

朱舜水与日本朱谦之 (189)

《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在日本的流传及其

影响戴燕 (195)

《吾妻镜》与《吾妻镜补》冯佐哲、王晓秋 (208)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夏衍 (218)

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王晓秋 (222)

杨守敬手稿《学书述言》与中日书法艺术交流陈上岷 (257)

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陈应年 (262)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日本	周一良 (283)
——兼论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的关系	
五四运动与吉野作造	陈本善 (302)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	夏应元 (310)
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	李 菁 (341)
鲁迅和有岛武郎	张 华 (362)
中日文学因缘杂记	林 林 (378)
中日诗谊	刘厚生 (383)
从音乐和戏曲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	阴法鲁 (396)
中日书法艺术的交流	叶喆民 (406)
中日古代体育交流谈	周西宽 (427)
从《新修本草》看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	吴德铎 (438)
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	王立达 (459)

二千年来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

邵 循 正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有两千年的深厚友谊，两国人民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不断记载而为历史学者们在研究中所不断阐明了的。

古代日本劳动人民以高度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他们同时虚心地向文化已有高度发展的中国学习。近代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年，也曾虚心地向日本学习过。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以日本为媒介，企图依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把中国从危难中挽救出来。虽然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文化终于已被证明不能拯救中国，但是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对当时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日本无论就地理形势上看，就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上看，都有不可割绝的息息相通的联系。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渴望更多的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交流。因此在今天回顾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历史，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在航海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已开始传入日本。日本山阴、北陆等地曾发现了很多形状酷似先秦古钟的日本制造的铜铎。日本历史学者认为中国早期文化

曾以原始的交通工具通过日本海左旋回流的自然航路传入日本。劳动人民以惊人的智慧和勇敢开辟了中日交通的道路。在同时期中,中国的铜剑、铜铎等物也经朝鲜横渡对马海峡传入日本北九州等地区。

在两汉三国时代,中国和北九州一带交通渐多。中国古籍如《汉书》、《魏志》所不断记载的“倭国”、“倭人”,即指北九州一带的居民。汉代古物在日本各地曾多所发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时代的货泉。曹魏和“倭女王国”(北九州)的正式联使来往,从公元238年开始,十年之中就有六次。中国珍贵的锦绣、毛织物和一般生活用品不断传入北九州。《魏志》“倭人传”记载,在三世纪初中国蚕业已传入北九州,当地居民把茧含在口中抽丝。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的组织,对日本也发生很大的影响。

到了公元后四世纪中叶,北九州已归日本大和朝管辖,日本不久就和中国的“南朝”开始正式的通聘。当时中国史料(如《宋书》)所提到的“倭国”,已经是泛指日本,不是专指北九州了。日本早同三国时代的孙吴已有来往,因此沿称南朝的宋、齐、梁、陈为“吴”。南朝中国人到日本的渐多,其中有著名的织工和裁缝。中国人在日本有特定的居留地,号“吴原”。这时日本不但衣服裁制和蚕织事业大大改观,一般文教和礼俗也深受当时中国南朝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开始学习汉字和中国书籍。日本史籍所称的“秦人”和“汉人”,早已由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等处不断地移入日本。这些人都是当时日本社会所欢迎的有艺能的人。如有些“汉人”就以织绢的优越技术取得了“绫人”的称号。此后更有不少的中国陶工、画工、鞍匠从百济移到日本。

到了隋唐时代,日本知识界直接探取中国文化的源泉。日本派遣大批学生到中国留学。这是两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重大的

事件。当时日本留学生中较多数的是为“求佛教”而来的“学问僧”，但入学于唐国子监的一般日本“学生”，学习范围之广，留学年限之长（多至二三十年），使他们有可能不仅研究中国传统儒学，并且精研中国文学或是法律、医药、天文等专门学问。八世纪的日本留学生中，如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玄昉、朝衡（阿部仲麿）都有名一时。朝衡卒业太学，留仕于唐。他同李白、王维等著名文人交游，留下很多诗篇。大和长冈学法律，回日本后删定律令。吉备真备研究经史，携唐礼、大衍历、乐书、兵器归国，相传日本通行的片假名，即出其手。“学问僧”在学习佛法外，也经常注意一般文化，回国时也带回大量的经典、碑帖和诗文集。唐代佛教艺术如佛寺建筑和佛像雕塑，对日本也发生很大的影响。

唐代中日密切来往的关系，在五代纷扰的局面下依然相当地保持着。当时的吴越和日本贸易来往特别频繁，因为明州（宁波）一向是中日交通的门户。不久，到十一世纪，日本统治者禁止人民私自渡海，日船绝迹于中国。但北宋商船仍不断前往日本，中日货物的交换依旧进行。中国商人携带的商品系锦、绫、香药、茶碗、文具等物，日本输出物品主要为砂金、水银、绵、绢、布和新发展的美术工艺品，如扇、屏风、螺钿、水晶细工、刀、剑等物。北宋东京（开封）相国寺的市场出卖着日本扇，宋代人赞赏扇上绘画说：“意思深远，笔势精妙。”欧阳修《日本刀歌》说：“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上述的其他工艺品也都受当时人的赞美。日本入宋僧人也备受优待。

到了十二世纪后叶，日本统治者奖励商舶和南宋贸易，南宋也注意招致外国商船。开庆《四明续志》说“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同时南宋在明州欢迎日本来船，“支送酒食，举行燕犒”，备极优待。中日商船往来于明州（中国对日的主要贸易

港)和博多(日本的贸易港)之间。贸易的频繁使宋代钱货盛行于日本。同时寄身商舶前来南宋的日本僧侣数目极多。南宋僧人也有许多前赴日本的。南宋特盛的禅宗不断传入日本。当时中国著名僧人的“语录”中常著录日本僧名。福州刻印各本大藏经传入日本,对日本印刷事业的发达予以极大的刺激。十三世纪初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学传入日本。1247年日本有人托名“陋巷子”覆刻宋槧本《论语集注》十卷,这是日本印刷中国儒书的开始。中国茶种和南宋人“吃茶”的风气,也经过禅僧盛传于日本。可见在南宋时期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在继续增长。

十三世纪后叶,元朝统治者和日本关系极端恶化,中国商舶绝迹于日本。但是日本商舶不断来到中国,一般说来都受到民间优厚的待遇。中日贸易仍占重要地位,日本也仍有许多僧人前来中国。嵩山少林寺留下有元时日僧古源邵元撰文的石碑。日本僧人在松江遇“巨水为害”,中国僧人念他“为异邦之人,苦留过冬,竭来七年,视以骨肉”。日本入元僧传中,还有许多类似的记载。

明、清两代中、日文化、经济的密切联系,更是超越前时。在足利幕府时期,日本使臣从宁波直至北京。他们沿途在杭州、南京等处都进行贸易。除一般工业品外,日本输出大量的铜和硫磺。明代铜钱大量输入日本,促进了日本国内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国绘画和其他艺术品引起日本人民普遍的兴趣。大批中国商舶开到日本的贸易港长崎。清代康熙年间贸易更盛,中国商舶携至日本的商品,包括了十五省的许多物产。中国书籍大量输到日本,德川幕府在长崎设专官检阅进口图书,以精识中国版本的人充任。明、清两代留居长崎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陈德明等人的医术,“长崎二妙”林道荣和高天滴的书法都深受日本人民的推重。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坚持反抗满清统治的朱舜水,他在日本开

创讲学的风气，日本学术界深受他的崇高的思想的熏陶。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入东方以后，中、日关系起了剧烈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日本学习西方较早较快，十九世纪的后三十年中，迅速地发展成为近代式的国家。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曾经热烈学习日本的经验，以为可以找到拯救中国的道路。不久中国青年大批地到日本留学，日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也大量地译成中文。辛亥革命前后的“新学”，大部分是从日本介绍到中国，这使封建主义的“旧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以日本为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他得到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过，也同日本学术界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有很大的关系。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已经从日本书籍转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同志，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经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他也曾从日文译著钻研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译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多种是从日文转译而来的。日本的译著对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帮助的。

两千年的历史说明了中、日两国除了在一些短时期中发生过战争以外，一直是和平共处的。其中有两次战争，也是最大的两次，发生在最近的六十年中。特别是后一次，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滔天的罪行，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凶恶的蹂躏，使日本人民遭受了痛苦的外国奴役，也使中日两国的正常的关系经过十年的岁月，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曾对

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作了许多努力。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和国家独立的愿望是深为同情的。中国人民深知，一个没有外力控制的独立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日本是亚洲和世界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因素。中日两国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的。这正如周恩来总理最近在接见日本新闻界广播界访华代表团时所说：“我们一贯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几千年来有着长时期的和平友好相处的历史，其间只有少数年份不是这样。人们常爱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照理，只要根据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说根据亚非会议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的十项原则，中日两国的关系就能够正常化，中日两国就能够达到真正的共存共荣。”

（原载 1955 年 9 月 5 日《人民日报》）

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

——译《日本绘画》序言

常 任 侠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有丰富的创造力和爱好美术的悠久传统。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有长期友好的关系。自从中国和日本两个伟大的民族有了接触以来，便互相学习，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在文化艺术的诸方面，有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古代的日本人民曾经遥遥渡海而来，不畏风波，从唐代的长安，带去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宝存至今，成为两国人民历史友好的证据。

在过去的悠长的封建历史时期，两国的艺术、都市建筑、礼乐、服饰、工艺、器用等等，都呈现了相似的形式，而又各具不同的民族风格，这些都表明了两国人民的文化关系，是如何深远。

中日两国仅一衣带水之隔，象并蒂的花枝，在古代的东方呈现出灿烂的色彩，散发着馥郁的芬芳。

日本人民的辛勤努力创造出了独具风格的美术体系。在遥远的古代，在日本的土地上，已展露出了美术的萌芽。日本考古学者所发掘的史前遗物，如绳纹土器，弥生式土器，埴轮土偶等等，这些原始朴质的塑造，是日本艺术的开始。日本东北地方的阿夷努（虾夷）民族，展布到日本的关东关西，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创造，在日本文化的曙光期，放射出光彩。

日本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相接触，大约始于汉魏时代。我国的《魏志》开始有了明确的叙述。而在日本由于汉委奴国王金印在志贺岛的发现，有不少汉代铜镜从瓮棺古墓中出土，魏景初三年（公元 239 年）铭文镜在大阪黄金冢古坟发现，中国汉魏时代的文化艺术，与古代日本文化艺术的密切接触，就有了实物证明。再从隅田八幡出土的画像镜铭文上，江田船山古墓出土的大刀银嵌铭文上，我们看见了六世纪初年（公元 503 年）的日本古代艺术遗物使用汉字记录历史年代的确证。可知至迟在汉魏时代，海洋虽深，风媒已播送了友谊的种子。两国人民的手臂，已经遥遥相挽了。

古代日本人民与中国的频繁接触，是在隋唐时代（公元 581—907 年）。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吸取怀着极大的热情，中国人民也以极大的热情相待。在隋代的仁寿年间（公元 607 年）日本派遣大礼小野妹子来使，自此以后，曾遣使三次。日本的使臣前来中国，偕有留学生同来，使臣回国后，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常达数年。在唐代，日本继续派遣使臣前来中国。据日本的记载（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所引），前后任命“遣唐使”共十九次。唐中宗至玄宗时期，日本四次遣使，规模宏大，人数众多，号为最盛。

日本遣唐使来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交流文化。遣唐使一般都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汉文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音乐长，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同行。来长安的遣唐使团人员常常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艺术随之介绍到日本。

当时中国人民对日本遣唐使的往返，亲切迎送，也常象兄弟般的难分难舍。这些遣隋遣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绘师、乐师、建筑师等，带去了中国大陆的文化艺术。日本艺术家们以之借鉴发展

着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

回溯日本钦明十三年(公元552年),汉文的佛典由东北陆路经百济渡海而传入日本,佛教的经论、造象不断的由大陆输往,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工、造寺工等也相随而至。因为崇信佛教,大量建筑寺院,雕塑佛像、绘壁画、绘经卷,日本的宗教美术有了很大发展。当他们对美术技法正多方进行研究的时候,无论创制或学习,中国的艺术家们,都尽力与之合作。这些早期艺人的名字,曾载入日本的史册。日本雄略七年(公元463年)七月诏命新汉陶部高贵,鞍部坚贵,画部因斯罗我等,迁居于桃原、下桃原、真神原等地。相传魏安贵公之子龙一名辰贵,也以善画入日本。这些从中国大陆去的第一批艺术工作者,对交流两国的文化艺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日本美术家的勤恳努力,这时期,日本的绘画与装饰画,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日本画派中的唐绘即产生于这个时期。

从日本飞鸟时期的艺术遗物看,法隆寺所藏玉虫厨子,作中国宫殿建筑式样。下承须弥座,正面绘《舍利供养图》,左侧面绘《金光明经舍身品舍身饲虎图》,右侧面绘《涅槃经圣行品施身闻偈图》,背面绘《须弥山图》。厨子上部宫殿部分,绘有天部、菩萨诸像,画法于黑漆地上,施以朱绿、黄等色,赋彩虽简,而线条雄健,似我国南北朝时代的画风。据传为推古时代遗物,初藏桔寺,桔寺既废,转送法隆寺。

又中宫寺所藏天寿国曼荼罗丝绣残片,据铭文为推古二十九年(公元621年)十二月圣德太子之母桔妃所绘,在这绣品上,残存有比丘敲钟、天女飞翔、玉兔捣药、莲花坐佛各部分。这两件遗物的绘画,虽然色彩简单,构图朴质,但是韵味笔致,都同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画风十分近似。当其时在中国画坛上,陆探微,张僧繇、曹

仲达等名家辈出，谢赫的六法阐述了绘画的原则，画风东渐，对日本初期的美术也有一定的影响。

日本奈良时代，在公元七世纪建筑的法隆寺，大体仿照中国宫殿式样，是古建筑的宝贵遗物。寺内金堂壁画，绘于七世纪末八世纪初年，妙相庄严，婉丽多姿，它与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同一风格。这个壁画是日本、中国和朝鲜的艺术家的精彩合作，成就极高。它不仅为日本人民所喜爱，也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不幸流传一千多年的瑰宝，近年遭到烧毁。与壁画同时的圣德太子像，服饰冠带，仿佛唐制，写貌传神，也仿佛是一幅美好的唐画，这幅肖像画被称为日本大和绘的初祖。在奈良正仓院中，曾保存不少唐代传去的艺术珍品，为日本艺术家所宝爱。我们研究日本的大和绘，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与唐画的密切关系。阎立本等名画师写真的技法，已经成为中日两民族艺术家们共同的遗产了。

奈良时代包括白凤（七至八世纪）与天平（八至九世纪）两个时期，前期的法隆寺金堂壁画与五重塔壁画，规模宏大，内容充实，而且艺术水平很高，是很有气魄的作品。在奈良时代的盛期，绘画内容，巧致有余，但缺少泼辣的味道，所谓丰丽柔媚，可以说是白凤时期绘画的特色。到天平时期，药师寺所藏公元八世纪的《吉祥天女图》，与正仓院所藏鸟毛立女屏风，作风相同，都是胎息于唐画的手法。据日本美术史家关卫所说：“这画的背面，记有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日本元正帝灵龟二年）的年号，其为中唐的画，自可明白。”（见《西城南蛮美术东渐史》）这些画用墨勾出轮廓线，施以丹绿蓝等色，论其技巧，若与张萱、周昉所画唐代的仕女对看，细致丰腴，色彩柔和，颇有近似之感。

正仓院所藏琵琶的拨面，绘有骑象鼓乐图，阮咸的拨面，绘有松下围棋图。两者虽然是附在乐器上的绘画，但这种即兴点染的

生活小景，不象佛画那样有一定程式，它可以自由抒写，随意表达人物的情态，因之更能看出当时写实技法所达到的成就。另外附在阮咸和琵琶上的，还有弹奏阮咸图，骑猎酒宴图，也属于这一类的绘画。从这些遗品上，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用油彩作画的技法，也已传到日本。日本著名的漆绘，据日本美术史家的研究，与中国的关系也很深，而且早植基于唐代。

八世纪的另一著名作品，是醍醐寺报恩院所藏的绘因果经八卷。这个绘卷以上图下文的形式，描绘了佛本生的故事，并且衬托着树木、山岩，其中人物的画法，以及表现树石的方法，写经的书法，都显示着唐朝的艺术作风。这个绘卷下启日本绘卷物的美术式样，并且是后来木刻印刷经卷上图下文的常用形式。

到八世纪末，日本都城由奈良迁于京都，从九世纪开始的平安时代，在画风上继续着唐绘的规范，盛行的仍然是佛教美术。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师）与最澄（传教大师）等随遣唐使入唐求法，带去了天台、真言两宗，并把唐朝佛教密宗的佛画图样也带入了日本，于是佛教美术由显教转于密教，出现了不少白描的图像。如京都神护寺的《金刚界曼荼罗》，教王护国寺的《胎藏界曼荼罗》便是九世纪的密宗佛画代表作品。此外著名的密宗佛画，如高野山智证大师的《赤不动尊》，园城寺僧空光的《黄不动尊》，以及和歌山的《五大力吼像》等，怒目注视，威猛慑人，强烈的色调与凹凸的画法，应是传习了中晚唐的佛画作风。又李真所绘金刚智、善无畏、大广智、一行、惠果等五祖肖像，由弘法大师传入日本，这种细致而谨严的写貌传神的技术，曾为日本肖像画家所重视。其后加入龙猛、龙智及弘法大师像，称为真言八祖。这些肖像画，长期成为日本肖像画法的基础。这个时期中国的画家，也有不少定居日本，子孙世传其业。日本、中国的美术家，相互学习，融汇调和。到了十世纪，日